

生命猶如比喻 —— 法國泰澤團體與貧窮人的團結共融

張名揚

澳門聖若瑟大學

University of Saint Joseph, Macau

一 引言

生命和比喻有甚麼關係？基督徒對貧窮問題的回應，可以有甚麼意義？一個形容自己為「比喻」的基督徒團體，為甚麼能在幾十年來吸引無數歐洲和世界各地的青年去和他們一起祈禱，並影響這些青年人的生命？這個團體對貧窮的回應，可以怎樣幫助我們反思信仰的實踐？我希望在本文對上述問題作部分解答。

本文首先會對泰澤團體（Community of Taizé）和它的創辦人羅哲弟兄（Brother Roger）有一個十分簡短的介紹。然後我會從法國哲學家保羅呂格爾（Paul Ricoeur）的詮釋學，尤其他對聖經比喻的研究和他的行動詮釋學，去建構一套可對生命文本作比喻化詮釋的理論框架。最後我會以這框架去詮釋法國泰澤團體 —— 一個跨基督教宗派修道者團

體一對貧窮和苦難的回應，分析為何泰澤在貧窮人中間的行動，在基督徒之間及俗世社會中引起這麼大的回響。

我的研究興趣是詮釋學和基督徒社會行動。泰澤之所以引起我的興趣，是因為（1）我曾經親身接觸這團體。他們對我有特別的影響力和吸引力，他們的行動常常啟發我；（2）他們在影響廣大社會的同時，公開並肯定地維持着一個基督教團體的身分；（3）他們結合了屬靈操練與社會行動；（4）他們是一個羣體，所以他們的行動是集體的和長遠延續的；（5）他們和團體的創辦人被不同的人認同，包括不同傳統的基督教和宗教領袖，不同年代的人，也包括俗世社會的組織，如聯合國。¹ 因此，泰澤的信息可說是跨界的：它能跨越諸如傳統、世代、文化、宗教和階級的界限。

二 泰澤團體簡介（歷史和性質）

（一）成立、目的和初期

泰澤團體的創辦人羅哲弟兄（Roger Louis Schütz-Marsauche）於1915年在瑞士出生，母親是法國人，父親是個更正教牧師。羅哲家中排行最小，有七個姊姊和一個哥哥。他在洛桑和史特拉斯堡修讀神學。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不久法國便分成北部德國佔領區和維希法國的自由區。羅哲因人類、尤其是基督徒之間的衝突感到非常痛苦。那時，他開始有一個心願，就是建立一個每天實踐修和的團體。他帶着這個心願來到法國，找尋一個他可以祈禱和服侍有需要的人的地方。最

¹ 羅哲弟兄在1988年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頒發「和平教育獎」。

後，他在法國東部布根地地區，距離佔領區不遠的一個叫泰澤的小村，買下了一座房子並住下來。雖然當時只有他一人，但是他的遠象是建立一個團體。他曾在這房子收留戰爭難民，大部分是猶太人，更不時帶他們逃到瑞士。由於祕密警察開始知悉他的活動，他在1942年一次帶人到日內瓦後便留在瑞士。在逗留日內瓦期間，他與三個年輕人開始在一個房子內過着團體式的生活。

直至1945年大戰結束，這四個人一起回到泰澤，自此有更多的弟兄（brothers，或譯「修士」）加入。1949年，有七位弟兄發願，承諾終生共同生活、分享靈性和物質的資源、守獨身以及在一位院長（即整個團體的僕人）之下團結合一。從此團體漸漸增長成形。起初所有的修士都是更正教徒，到了1969年才有第一位天主教徒加入，那時泰澤已經約有五十位弟兄了。現在泰澤約有120位修士，來自不同的宗派背景。在成立初時已有一些人探訪他們，但在第二次梵帝岡公教會議（簡稱梵二）後期，有愈來愈多的青年人到泰澤，與修士一起祈禱和尋求修和（reconciliation）。因此，泰澤在1966年舉行了第一次國際青年聚會，約有1400人參加。

（二）和平與和好

終其一生，羅哲弟兄最關注的是基督徒之間為着世界和平而修和。從他與法國改革宗基督徒和天主教幾任教宗的接觸，可以看出他為合一而作出的努力。1961年，在羅哲弟兄的建議下，天主教主教和更正教教牧在泰澤舉行有史以來第一次會議。他與另一位弟兄麥斯（Brother Max）更獲邀在梵二擔任觀察員。作為一位更正教基督徒，他與羅馬教宗尋求和好時，亦不放棄自己信仰傳統的根。再者，他與東正教的幾位牧首（patriarchs）都保持良好的關係。因此當羅哲弟兄在2005年8月16日晚禱時被一個精神有問題的女人用刀刺死，許多人都十分震驚，想不

到這位一生都貢獻於締造和平的人，最後竟死於暴力。他院長的位置由艾樂思修士繼任。

（三）修道生活與年輕人聚會

今天，泰澤主要接待青年訪客，只有少量位置留給三十歲以上的人。每天的作息圍繞着三次禱告來安排。² 在禱告的時間裏會眾會唱著名的泰澤歌詠。全世界有不少人都是因為這些美妙的歌開始認識泰澤。在晨禱和早餐之後是教導聖經的時間，一位修士會講解一段經文，然後訪客可以分組討論他們的見解和分享經驗。在午禱和午餐後，訪客便會加入不同的工作小組，藉分擔工作，如做飯和清潔等，互相服侍。在晚飯前會有些自由時間，然後以晚禱結束一天的活動。每周五的晚禱後，一個十架聖像會平放在教堂「修和堂」的中央，人們可以上前圍着它祈禱，有很多人都會把前額放在十架上表示與基督團結共融。

每年年終泰澤都會在一個歐洲城市舉辦國際青年聚會。近年的主辦城市包括波蘭波茲南（2009年）、鹿特丹（2010年）、柏林（2011年）和羅馬（2012年）。柏林經歷多年的分裂，而羅馬則在基督教會有獨特地位，在這兩個城市舉行聚會，使和平與修和的主題更添象徵性意義。每次聚會期間，當地的信徒會開放自己的家去接待來自各地的青年人。此外，泰澤在其他洲也定期舉辦國際青年聚會。

² 關於訪客在泰澤一天的活動，在 Jason Brian Santos, *A Community Called Taizé: A Story of Prayer, Worship and Reconciliation* (Downers Grove, InterVarsity Press, 2008), 22-52 裏有生動的描述。

三 呂格爾與行動的詮釋

泰澤喜歡形容他們自己為「團體的比喻（a parable of community）」。比喻是甚麼？一個最簡單的定義可以是「帶有教訓的故事」。雖然這個定義相當接近，但不夠準確。故事和教訓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故事怎樣「帶」出教訓？讀者怎樣知道故事的教訓是甚麼呢？這教訓是怎樣被「放進」故事之中的呢？還是其實它是從故事中「抽出來」的？

要理解比喻是甚麼，我們需要借助法國哲學家呂格爾的詮釋理論。在他對比喻的研究中，呂格爾提出對「比喻化」過程的定義：「比喻化」是論述的「隱喻化」過程。我們可以暫時說，比喻是隱喻化了的故事或敘事（narrative）。要理解呂格爾的隱喻和比喻理論，則須從他的想像力和詩意語言理論入手。

（一）語言的創造性和行動中的想像力

對呂格爾來說，隱喻和想像力有着密切的關係。他指出隱喻並不是在字詞的層面，而是在句子的層面發揮作用的。因此，我們不應說隱喻是給一事物一個新的或陌生的名稱。陌生的效果是關鍵的，不過，這是在句子的謂語（predicate）層面上發生。所以說，隱喻是一個「奇怪」的謂語配置（predication）。在隱喻最基本的形式，如「時間是個賊」裏，³ 在一句句子里放了兩個意義上通常不相干的詞。這些詞各自的語意範圍（lexical semantic field），即在詞典中能找到的意義，是沒有關連或重疊的。這樣的句子表面上是沒有意義的。要建立它

³ 香港電影《歲月神偷》的名字正用了這個隱喻。

的喻意（即隱喻意義），需要由想像力去發現或認出一種新的「比擬（resemblance）」。不相干的謂語配置打碎了字面意義，而想像力的介入，導致語意範圍發生「重組」，一種新的意義在字面意義的碎片之中出現。所以，這種「比擬」是一種具創造性的謂語配置行動。在這裏，想像力有兩個作用：（1）想像力懸置了字面意義，以致語意範圍的重組可以發生；（2）想像力把分開的語意範圍拉近在一起，它在不相似中「看出」了相似。只有當奇特的謂語配置引起字面意義的衝撞，因而打破熟悉的意義後，新的意義才能夠在這種字面意義的懸置之中，被創造出來。

不過，在這個把不似變為相似的比擬過程之中，原本的字面不協調並未有因為新的協調出現而被丟棄。相反地，這種在語意上「不相關」的抵抗力不應被丟棄，因為隱喻的意義是同時在相似和差異中建立的。用呂格爾的話，想像力「能透過比擬產生新的類形；這些新的類形並不是在差異之外，反而是克服和透過差異產生的。」⁴ 相似和陌生之間的張力必須繼續存在，隱喻才仍然是活的：它的意義可以不斷更生。當喻意被收錄在詞典裏，便變成了死的隱喻（例如「千金」喻意女兒），不能再引發想像了。

所以對呂格爾來說，想像力原本是語言性的，亦因此是具創造力的。詩意語言有別於純描述性語言，描述性語言盡量忠實地描述現實，而詩意語言的目的是重新描述現實，為熟悉或日常的事物提供另一個形象。要詮釋詩意語言，關鍵在於想像力。想像力讓我們可以以不同的眼光看事物，為新的意義創造條件。另一方面，因為想像力有懸置的功能，所以它亦是行動的關鍵。我們會用想像力建立一個思想的實驗室，

⁴ Paul Ricoeur, "The Metaphorical Process as Cognition, Imagination, and Feeling," *Critical Inquiry* 5 (1978): 148.

去試驗某個情況下不同的可能行動。這樣，我們在思想上暫時脫離了感知和行動的世界，可以自由地衡量各種不同的因素、目的、價值和可能出現的後果，幫助我們決定我們的行動，換句話說，想像力幫助我們以新的途徑去與世界（重新）接軌。

（二）聖經與想像力：隱喻、敘事和比喻

呂格爾從文本着手的進路，使我們對比喻的定義有更多反思。在聖經裏，比喻不單是敘事，更是在另一敘事即福音書之中的敘事。比喻就在與圍繞它的敘事互動下，透過「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被「隱喻化」。呂格爾認為最先提示比喻不應以表面意義理解的，是它以「嵌入的敘事」（embedded narrative）出現。事實上，聖經裏的比喻不單只與緊貼它們周圍的文本互動，在耶穌的比喻中，很多有着象徵意義的形象是出自希伯來聖經的，例如葡萄園的景象。此外，不同比喻之間和比喻與周圍的福音書之間，因為主題的重複和人物角色的置換而有關連。人物角色的置換是指耶穌既作為說比喻的人，又在比喻中提到自己和將要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在比喻中所發生的事更超越了正常故事的慣例。舉個例子：甚麼人會在僕人遭園戶殺害之後，還把自己的兒子差去葡萄園呢？關於這一點，呂格爾寫道：「敘事透過對敘事技藝的『奇特』運用超越了自身的故事結構，從而隱喻化了自己。」⁵ 這種在文本之間的運作（intertextual operation），在敘事的比喻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⁵ Paul Ricoeur, "The Bible and the Imagination," in *Figuring the Sacred: Religion, Narrative, and Imagination*, trans. David Pellauer, ed. Mark I. Wallace (Minneapolis, MN: Fortress, 1995), 165.

然而，耶穌在福音書中所說的比喻並非意指某些具體的「教訓」，它們是用來教導有關上帝國的一些事情。上帝國這一表達的意義並非來自比喻中的人物的行動，而是來自在比喻中所發生的事，就是對慣常（約定俗成）的敘事邏輯的逾越和顛覆。上帝國因此沒有一個可以被公式或具體計劃完全覆蓋穩定的意義。從這個角度看，它真的不是屬這世界的國度。

（三）從文本到行動

既然比喻是敘事，是文字寫成的，我們怎可以說一個人或羣體的生命是個比喻呢？首先我們要注意，以比喻來形容生命和行動本身就是一個隱喻式的用法。其實文本和行動的距離，或者並非我們最初理解的那麼遠。在這方面，想像力固然可以幫助我們，我們還可以借用呂格爾的理論。他嘗試把詮釋文本的方法，應用在詮釋人的行動上。在他一篇重要的文章裏，呂格爾指出「有意義的行動」顯示了一些特性，以致它們類似書寫文本多於說話。⁶ 他先以詮釋學的角度從四個層面分析文本的特性以突顯文本和說話分別，然後根據人的行動，在各層面中與文本的相似來支持他的立論，就是我們可以如詮釋文字般理解有意義的行動。以下是這四個層面的簡短描述：（1）客觀化（**objectification**）：書寫的文本和人的行動皆相似地「留下印記」；（2）自主化（**autonomization**）：當行動被客觀化並被詮釋時，作出行動的人，如文本的作者一樣，可以說是不在場的；（3）重要性（**importance**）：正如一部文化傳統典籍可以在不同時代被重新詮釋，一個有意義的行動的

⁶ Paul Ricoeur, "The Model of the Text: Meaningful Action Considered as a Text," in *From Text to Action: Essays in Hermeneutics, II*, trans. John B. Thompson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1), 144-67.

重要性，也不只限於行動發生時的處境；（4）開放性（openness）：說話有特定的對象，但一個文本的對象是「任何識字的人」；人的行動也可以由後世的人所「閱讀」、評價、詮釋及賦予新的意義。⁷

除了建議把詮釋文本的方法應用在詮釋人的行動之上，呂格爾的敘事理論也把人的行動和文本以時間為中介，互動地連繫起來。他對敘事（包括歷史及小說）的研究，指出敘事怎樣透過建構「劇情」（plots），來給人在時間中的經驗賦予意義，從而使人的行動也顯得有意義。呂格爾也指出詮釋敘事怎樣能夠透過向讀者提供對世界的一個新的看法，來進一步重塑（refigure）讀者的行動和他們在世界中的自處（being）。⁸ 歷史和虛構 事都在不同的程度上運用詩意語言，倚賴想像力來建構一個過去的或虛構的世界。在閱讀的過程中，讀者的想像力把自己從現實世界的場境中懸置起來，投入在文本的世界中。在這個過程後，當讀者「回到」自己的世界，便會對現實和自己在這現實中行動的可能性有新的、被拓闊了的看法。文本的世界透過這樣的閱讀和挪用（appropriation，或譯「內化」）的過程，與讀者的世界相遇，從而影響讀者的行動。

（四） 從生命故事到生命比喻

既然詮釋生命和行動跟詮釋文本相似，那麼我們可參考比喻的分析，嘗試以互文的方式，來解讀泰澤團體和它的創辦人羅哲弟兄的生命和行動。

⁷ 參 Ricoeur, "The Model of the Text," 150。

⁸ 呂格爾在敘事研究方面最重要的著作是《時間與敘事》三卷。英譯本 Paul Ricoeur, *Time and Narrative*, 3 vol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8)。

首先我們要留意內部結構，即比喻怎樣構成一個整全的文本或敘事。以呂格爾的說法，我們分析比喻的「構塑」（configuration）。

第二，我們要注意比喻與上下文或周圍的處境之間的關係。這裏牽涉兩個層面：第一個是「熟悉點」，即連繫比喻和上下文／處境的共同主題。第二個是「反差及越界」，即那些不協調或令人詫異、令人大惑不解、前所未有或意料之外的地方。注意並保留這些主題之間不協調的張力，是決定性的一步，因為由「意義懸置」所引起的方向迷失正是「重新」定向，即以新的方式去想像與行動的必要條件。

第三，我們（作為基督的跟隨者）要把這比喻「嵌進」我們的生命之中。誠然，只有我們把我們的生命和行動變成故事，一個「懷抱」我們所讀的比喻的故事，互文式的閱讀才算真正完成。

第四，我們要把它當作比喻來詮釋。換句話說，我們要避免純字面的理解。從實踐的角度來看，就是我們不應純粹模仿他們的行動。反而，我們要讓這比喻擴大和豐富我們的想像力，以致我們可以看到創新而適切我們境況的行動的可能。

四 在世上和在貧窮人中間活出比喻

就本文的主題——泰澤團體對貧窮的回應，我會以三個重點作比喻化的詮釋，分析他們的行動和生命能影響這麼多不同的人的原因。

（1）他們過着自願貧窮的生活；（2）他們拓闊了對誰是貧窮人的理解；（3）他們回應貧窮的行動超越了一般對「扶貧」的想像：一方面他們給予的幫助超越物質上的捐助，另一方面，他們與貧窮人建立了相互的關係。他們付出的同時，也肯定貧窮人能夠付出和給予他人靈性上的幫助。

（一）自願貧窮

泰澤團體以簡樸的生活回應世上的貧窮。他們沒有個人財產，拒絕接受捐獻，修士也會把任何承繼的家族遺產分給窮人。他們生活所需的收入，來自他們手所作的工：在泰澤的小店出售的陶瓷器皿、手工藝品、畫、明信片、書籍和音樂等。他們多年來如何自養也是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礙於篇幅所限不能詳述。

羅哲弟兄希望泰澤團體依據一種「當下的活力」（*dynamics of the provisional*）來生活。他認為，我們愈是只保留生命中必要的事，便愈被這種活力所釋放，以致在面對愈來愈急速的改變時仍然有氣可透。⁹「活在當下」不只是適應改變的方法，更能把基督徒的合一連繫到「在年輕一代、不信者和窮人中間活出福音」的使命。對羅哲弟兄來說，合一不能只滿足於「和平共存」，基督徒間可見的修和不應拖延。¹⁰他認為基督徒若要步向合一，必須以行動和可見的姿態把自己與全人類聯合起來，包括：「避免代與代之間的決裂，與不能相信者會面，聯合貧窮人的世界。」¹¹

羅哲弟兄提醒我們「活在當下」和簡樸並與窮人分享物資是不可分割的。雖然他也提到靈性的資源（*goods*），但重點仍然放在物質資源上。既然所有的好處（*good things*）都是從上帝而來的，所以他認為亦毋須太絕對地分開靈性和物質。而在傳福音的處境中，一個「當下」的生命應該是一個相信上帝的供應的生命。羅哲弟兄認為，基督徒不能

⁹ Roger Schutz, *Dynamique du provisoire* (Taizé: Presses de Taizé, 1965), 9: "Face à l'accélération de toutes les évolutions, une dynamique du provisoire, qui laisse d'autant plus libre que l'on est plus fidèle à l'essentiel, permet de reprendre encore et toujours un nouveau souffle."

¹⁰ Schutz, *Dynamique du provisoire*, 15-16.

¹¹ Schutz, *Dynamique du provisoire*, 20.

以一個累積物質儲備的生命去見證上帝的供應；我們不能既在世上的保證（金和銀）中找安穩的保障，又說只信靠上帝。那些不能相信（上帝）的人有理由要求基督徒「證明」他們的上帝是值得信賴的。基督徒對上帝完全信靠和與窮人分享物資是世俗世界和神聖國度之間的連繫。基督徒對世上的苦難責無旁貸，重要的是如何關心世界和如何將有意義的神聖標記帶進世界，而又不曾與信心之源——上帝——隔絕。

支持着泰澤這強大的「活在當下」的志願的是對上帝深度的信靠。活在當下就是活在對上帝的信靠之中。這是對一個可靠的、良善的和慈愛的上帝的信靠。有了這種信靠的支持，生命便會對改變開放，而行動時又不會作過於長遠的計劃或承諾。

羅哲弟兄把這樣對上帝的完全依靠，連接到「八福」的第一福——「貧窮的靈」之上。¹² 他指出，西方的基督徒在愈來愈急速的轉變所引起的憂慮之中，已經失落了「上帝的供應」的意義。然而，基督徒可以在與窮人接觸時，重拾上帝供應的意義。假如基督徒相要真正信靠上帝，他們應該放棄「增加各類的保障」（因為「這樣做會使〔他們對上帝的〕信靠顯為謊言」），以致他們可以「尋求上帝並只在〔上帝〕那裏有保障」。¹³ 羅哲弟兄認為（在六十年代西方）新的一代要和基督徒保持距離的原因，就是基督徒不能見證他們信靠上帝。

¹² 參太三和路六20。Schutz, *Dynamique du provisoire*, 82: "Animé d'un esprit de pauvreté, l'homme dépend de Dieu seul."

¹³ Schutz, *Dynamique du provisoire*, 82.

（二）與貧窮者團結共融

愛把泰澤的修士帶到窮人中間。羅哲弟兄一直被最貧窮地方的人的苦難所觸動。泰澤團體能在最困乏的人的苦難上有分的其中一個途徑，就是與他們一起生活。泰澤在世界很多地方成立了「友愛之家」（fraternities）。在那裏，一些修士與貧窮人一起生活多年，有些甚至一生大部分時間都住在那裏，與周圍的人有着共同的生活條件。羅哲弟兄知道這不能立即解決貧窮問題，但他希望「去愛並以生命說出來」，使他們的生命和行動能「成為愛的一個簡單臨在」。¹⁴ 其實，泰澤在成立初期便已開始這樣做，起初在附近的礦場與礦工一起工作和生活，後來擴展至世界其他地方。羅哲弟兄便曾經每年花一些時間在不同地方，如南美、印度、菲律賓和七十年代的香港（因為香港是他可以到而最接近中國的地方。當時，他跟香港仔艇戶住在一起），在貧窮人中間生活。

生活在「友愛之家」的修士，把貧窮人的生活連繫到在法國泰澤的生活。他們保持與泰澤一樣，每日三次集體禱告的節奏。這種靈修生活的模式，和為禱告默想而設的聖壇的簡單裝飾，把「友愛之家」與泰澤象徵性地連起來。「友愛之家」是泰澤團體非常重要的部分。羅哲弟兄強調，他們在最貧窮的人中的同在，為住在泰澤的修士注入力量。

與窮人一起，與最困乏的人並肩生活，共享物資只是最基本的行動。羅哲弟兄有一個「合一的社會教導」的遠象。在這遠象裏，除了分享，也要「在人的提升上參與」、「合作」和「建立夥伴」。他寫道：「今天，慷慨而抽離的態度是不足夠的，要與世界的悲苦結連，便要參

¹⁴ Roger Schutz, *Choisir d'aimer: Frère Roger de Taizé, 1915-2005* (Taizé: Presses de Taizé, 2006), 93.

與這世界為脫離悲苦所作的掙扎。」羅哲弟兄更提出，其中一種「人的提升」，就是教育第三世界的青年人。¹⁵

泰澤團體愛的行動，源自他們與上帝的契合。他們視默觀式禱告為接近上帝和對上帝開放生命的一個特別途徑。羅哲弟兄說：「禱告不會使我們遠離對世界的關注，相反，沒有比祈禱更負責任的行動。我們愈活出謙卑的禱告，愈會被牽引去愛和以生命說出來。」¹⁶ 在1978年的《青年會議紀述》（*Acts of the Council of Youth*）中也如此說：「我們愈在默想基督之中接近基督徒生命之源，愈會被牽引，去尋找可以在生活上的具體情況落實的行動。」¹⁷

泰澤緊緊地拉着「與貧窮者團結共融」和「尋求和平」之間的張力。不是所有團體的成員都住在泰澤的村莊裏，任何時候都有約四分之一的修士住在世界各地最貧窮的人中間。他們住在那些有着貧窮和衝突，以致有人受苦的地方。在這地方，他們和當地人在同一境況之下生活在一起，但同時，他們以他們的同在傳播信任和復和。正如一位聖公會牧師指出，很多時我們渴望和平其實是想要舒服的生活，¹⁸ 但泰澤的實踐，挑戰我們在尋求和平與復和時所採取的「無傷大雅」或無需付出代價的做法。正如潘霍華向我們發出「廉價恩典」的警告，那麼，泰澤給我們的忠告，正是要小心「廉價和平」的危險。

¹⁵ Schutz, *Dynamique du provisoire*, 85-88.

¹⁶ Schutz, *Chosir d'aimer*, 57.

¹⁷ Kathryn Spink, *A Universal Heart: The Life and Vision of Brother Roger of Taizé*, 2d ed. (Chicago: GIA Publications, 2005), 136.

¹⁸ Stephen Cherry, "Taizé and the Way of the Blessed (Sermon Preached on Aug 30, 2009)," Durham Cathedral, <<http://www.durhamcathedral.co.uk/schedule/sermons/387>> (accessed 28 January 2011).

泰澤核心的和平固然是內心的平安，藉禱告和靜默靈修達致與上帝的共融。但在實際行動中，在最「被動」的活動和最「積極」的活動，即祈禱和爭取公義之間存在着張力。縱然如此，這兩端對泰澤團體來說卻是互相維持的。當羅哲弟兄說，「沒有事情比祈禱更負責任」的時候，¹⁹ 他指的是對社會的責任。但同時，有部分修士多年甚至差不多一生都與世上最貧窮的人並肩生活的這個事實，正支持着留在泰澤的修士。套用羅哲弟兄的說話，因着他們與最貧窮者的同在，「我們並沒有捨棄地球上最不幸的人。」²⁰

所以，泰澤對貧窮人的憐憫和行動，並不限於捐贈物資或人道援助等一般慈惠工作。當然，他們也做了不少這方面的工作，例如羅哲弟兄捐出所有得到的國際獎項的獎金，而團體自1964年成立的「希望行動」（Operation Hope）多年來幫助了世界上很多人。但是對他們來說這並不足夠，他們對基督的愛和對上帝的愛的信心，催促他們踏出更徹底的一步：他們去和貧窮人住在一起，成為愛的具體可見標記（signs）。羅哲弟兄說：「我們的團體自從最早期開始，便覺得必須有一些弟兄去分嘗最貧乏的人的生活。」²¹ 他們嘗試融入所在的羣體之中，並就所能去提供實際幫助。例如在孟加拉，一些修士已在那裏住了超過三十年，他們會

……邀請最窮困的人與他們一起用餐。他們接待和支援殘障者，又確保有病的人得到所需的照顧。他們也協助當地的年輕

¹⁹ Roger Schutz, *A Path of Hope: Last Writings of Brother Roger of Taizé*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2006), 36, 61.

²⁰ Schutz, *Choisir d'aimer*, 93. 參 Schutz, *A Path of Hope*, 55-56。

²¹ Schutz, *A Path of Hope*, 55.

人以不同的方式去對赤貧者作出承擔，例如為兒童辦小規模的學校。從一開始弟兄們便與穆斯林信徒建立了互信的關係。²²

這種同在和幫助，在全球性貧窮的巨大難題和痛苦面前，好像顯得很有限，但是修士們覺得非常重要，他們不可以把自己隔絕在世上的苦難之外。正如羅哲弟兄所說，「若非我們一些弟兄住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最貧窮的人中間，試問我們怎可以在泰澤繼續下去？」²³

泰澤團體對東歐共產政權下的基督徒的支持提醒了我們，除了物質的貧窮外，受壓制的人也是貧窮人。假如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苦難，多是由物質上的缺乏所引致的，那麼歐洲所經歷最深的苦難，至少在柏林圍牆倒下前，是源於戰爭的破壞和遺害：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東西的分隔，以及在共產政權下對政治和宗教自由的剝削。²⁴ 泰澤的修士把這些苦難都放在心上，他們以不同的方式去鼓勵那些絕望和受壓逼的人，例如在東歐共產政權下的基督徒。在柏林圍牆倒下後，人們才知道泰澤的修士已經長時間與東歐國家的基督徒和年青人接觸，這些接觸很多時需要透過祕密私人探訪來進行。這些行動的果效，多少可以從1989年以後，從前共產國家（例如波蘭）到訪泰澤人數的驚人增長反映出來。

當年，共產政府雖然批准他們到訪當地教會，但很多時不容許他們對人羣說話，甚至連開聲領禱也不可以。但是，羅哲弟兄和其他修士堅持繼續探訪。羅哲弟兄說：「漸漸我們明白到……就算只站在他們中間，與他們並肩祈禱，與他們一起靜默，也是有意義的。」²⁵

²² Schutz, *A Path of Hope*, 55.

²³ Schutz, *A Path of Hope*, 56.

²⁴ 事實上，在1990年前後，一些書信是在東歐國家寫的：1988/89年在俄羅斯，1990/91年在布拉格。

²⁵ Schutz, *Choir d'aimer*, 101.

兒童在羅哲弟兄心目中，一直有一個特別的位置，他們代表着世界上無權和脆弱的一羣。在團體成立初期，他們收留了一班戰後被遺棄或成為孤兒的男童，他們由羅哲弟兄的姊姊 Geneviève 照顧。雖然這些兒童似乎是受惠的一羣（事實上他們也是），但羅哲弟兄肯定他們對團體的貢獻：「我想，在我們共同生活的初期，因為這些完全倚靠我們的孩子與我們一起，我們得着很大的支持。」²⁶

羅哲弟兄也為兒童的福祉發聲，為他們的苦難深感難過。當他在泰澤的教堂——修和堂——祈禱時，總帶着一些小孩子在他身邊。²⁷當他去訪見「大人物」（例如當年馬德里的美蘇兩國大使，或聯合國祕書長）時，也帶着不同種族的孩子。他這樣做是要提醒這些有權力的人，他們所做的，對所有人、包括這些小孩，都有着重大的影響，他們應該運用他們的權力去服侍他們，而不是去傷害他們。一方面，這些不同種族的兒童象徵着全人類的將來，另一方面，他們每個人的將來，也是真實地受到世上的戰爭衝突所威脅，但他們卻無法為自己發言。羅哲弟兄說過，若他可以照顧小孩，他會盡力避免他們的純真受到傷害。²⁸

泰澤對最軟弱者的照顧，顯出上帝的愛。這些最軟弱的人包括：在戰爭時的難民，和在戰後的孤兒及在泰澤附近的戰俘營中的德軍戰俘。這些人是不能回報他們的。因此，稱泰澤團體為「好撒瑪利亞人」或者「基督在終末的時候會嘉獎的人」也絕不為過。²⁹

²⁶ 引用在 Spink, *A Universal Heart*, 54。

²⁷ 這是 Catherine Lalumière 對羅哲弟兄的形容，見 Bruno Chenu et al., *Taizé, au vif de l'espérance* (Paris: Bayard, 2002), 238。

²⁸ Spink, *A Universal Heart*, 126-29. 羅哲弟兄的說話引用在頁127。

²⁹ 詳見路十25~37 和太二十五31~40。

除了窮人和兒童之外，年輕人更是泰澤特別重視的服侍對象。他們怎樣服侍年輕人呢？泰澤每年接待成千上萬的年輕人（年齡介乎在十八至三十歲之間），修士們在他們尋找生命意義的路上陪伴他們，聆聽他們傾訴他們的渴望與沮喪、理想和需要。多年來一代又一代的年輕人不斷湧到泰澤，當中有很多人每年都回到泰澤，有的還帶着他們的下一代，可見泰澤在他們身上的影響。泰澤並沒有任何吸引年輕人的策略，但歐洲的年輕人不願意去教會，卻到這個地方祈禱。面對着他們，修士們所做的便是回應和接納，以及思考衡量他們可以為年輕人做甚麼。

泰澤提倡基督徒與基督徒之間、人與人之間的互信，而泰澤對年輕人徹底的信任，正是言行一致的表現。一位作者（本身是美國服事年輕人多年的牧者）甚至指出，「得到信任」的經歷，是泰澤的其中一個主要「賣點」。他舉例說，每個到訪泰澤的人，都會被委派去負責不同的工作。³⁰ 泰澤不但信任年輕人，更非常希望把這種信心告訴他們，羅哲弟兄甚至說：「……至於我，若我可以，我願意去到世上每個角落，一次又一次地宣告我對年青世代的信心。」³¹

在他們對貧窮者的支援中，泰澤不會只顧追尋愛的實踐而失去對公義之要求。在2011年的〈智利來鴻〉中，艾樂思修士寫道：「在緊急狀況下，物質援助是必要的，但這還是不夠的，重要的是恢復貧困者的公義。拉丁美洲的基督徒提醒我們，對抗貧窮就是為正義而戰鬥：這是指在國際關係中的正義，不是援助。」³²

³⁰ 見 Santos, *A Community Called Taizé*, 141。

³¹ Schutz, *A Path of Hope*, 58.

³² 艾樂思修士：〈智利來鴻〉，《泰澤書信》270（2011）。

（三）與貧窮人的相互關係

羅哲弟兄告訴東正教神學家克萊門特（Olivier Clément），他們與窮人的共同生活，是「福音火熱的氣息」（souffle brûlant），這氣息「充滿着留在歐洲各人的召命」。³³ 這樣的描述，也適合用來形容泰澤為了接近教會內、社會上和世界上最小最低微的人，並與他們同行所作出的努力。羅哲弟兄的這番話，也道出了泰澤和窮人之間相互的（reciprocal）關係，而泰澤也一直視自己為福音書裏的貧窮者。

事實上，這種「同在」或「一起受苦」的行動，正是羅哲弟兄對憐憫（compassion）的理解。他肯定地說道：「……如果基督只是那樣，只是個憐憫的基督，於我來說便已足夠。」³⁴ 泰澤的修士，透過他們的聆聽、陪伴，甚至只是靜默的陪伴，所給予那些正在受苦的人的，便是這種憐憫。這些最「被動」的「行動」（如果我們可以稱它為行動的話），也可以理解為在苦難面前，對行動的有限性的一個詩意（創新的）回應：那就是向徹底的惡回應以徹底的憐憫（或稱之為「愛」）。

縱然泰澤承認富人或是權勢的影響力，並要求他們作出促進和平公義的決定，但團體並沒有與這些人結盟。當泰澤做有關人的工作時，他們把注意力放在世界上最卑微和最無權力的人身上。他們想改變世界，但不會因此而拉攏有權力的人，不論是組織上、政治上或是經濟上的權力。反而，他們為「小子」、為貧窮和弱小的人做事。這使人想到在馬太福音中，王對那些「義人」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做在我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³⁵ 不單如此，泰

³³ Olivier Clément, *Taizé: Un sens à la vie* (Paris: Bayard, 1997), 18.

³⁴ Spink, *A Universal Heart*, 176.

³⁵ 詳見太二十五31~46。

澤的修士不只為無權者做事，更與他們攜手和透過他們做事。泰澤看到貧窮人的恩賜、把修和的事工交託年輕人，更聆聽他們和向他們學習，以致可以辨識聖靈的工作。

泰澤的修士對上帝的信心，使他們甘於貧窮，仰賴上帝的供應，也使他們的行動有着一種「即興」的特質。由於可以掌握的不多，他們便在困難之中發掘無窮之可能，並對上帝的計劃和聖靈的引領開放。因此，在泰澤，沒有甚麼是不可以改變的，他們生活上的一切都是「臨時」、可變的。

需要改變，除了因為處境變化和發現錯誤之外，泰澤活在當下的臨時性，更有順從聖靈的意義。要知道聖靈的心意，必須聆聽聖靈的聲音。在泰澤，上帝的聲音是透過留意微小的聲音而辨別出來的。這些微小的聲音，是那些在教會和社會裏被輕視或忽視的聲音，是來自弱小者、年輕人和窮人的聲音。羅哲弟兄直覺上認為，上帝主要是透過貧窮者說話。當年，他為了找尋落腳的地方而第一次來到泰澤的時候，就是因為一個窮苦婦人的說話，促使他決定買下這小村莊的一間房子。修士們也因為對年輕人的信任，自從第一批到訪者起，便一直聆聽和嘗試明白他們。甚至，泰澤當年舉辦青年會議（與第二次梵帝岡公教會議平衡進行）的部分原因也是基於年輕人的提議。

與貧窮人一起生活，不單要聆聽，也要「閱讀」：即發現在他們身上顯出來的善和希望。泰澤團體十分注重詮釋他人的行動和生命，並在其中發現見證。這些經過詮釋的生命，往往對團體的生命有重大的影響。本文較早時亦提過，羅哲弟兄認為，與窮人接觸，可以幫助基督徒重新經歷何謂「上帝的供應」。

每年，泰澤的院長（以前是羅哲弟兄，現在是他的接班人艾樂思修士）都會去一些最貧困的地區探訪。通常，在這些探訪期間，他會寫一封信，在年終的歐洲聚會中發表。在接下來的一年裏，泰澤會邀請來到的人去默想信裏面的主題。在這些信裏，院長會描述修士們在某個

地區或國家的經驗，指出一些當地的困難，但也會講述修士們怎樣在與當地的人共同生活時，獲得心靈上的啟發。除了提醒讀者，不要忘記在世界另一角落的苦難，院長也會寫到他在旅程中遇到的人身上發現希望的標記：包括他們的慷慨、好客、喜樂、信仰的堅守和令人驚訝的互助能力，以及他們在物資匱乏和極度困難的情況下，如何仍然樂於分享所有。在某種意義上，這些信提醒每一個人，特別是那些生活在物質富庶地方的人，那些似乎甚麼都沒有的人，可能有着生命中最寶貴的東西，而且他們的生命能夠感染他人。

五 結論

比喻和隱喻的力量，在於它們維持了熟悉和陌生之間的張力，因此可以創造新的意義，生命的比喻更是如此。綜觀本文在「貧窮」的主題上的觀察和詮釋，泰澤團體的行動之可以有如此強的影響力，主要在於以下幾點：

- (1) 他們的基督信仰，並且着重信仰裏「信」和「愛」的信息。
- (2) 他們的言行一致：信靠上帝的供應，信任和接納年輕人，願意聆聽和嘗試了解他們，更在貧窮人中間徹底地實踐信心和愛，使「信」和「愛」的信息明顯而強烈。
- (3) 另一方面，他們的自願貧窮、自我倒空，與基督的教訓和他們服侍的對象一致，卻與這世界主張對財富和權力的追求背道而馳，因而形成對比和張力。但這種與世界的張力卻也繼承了基督教修道團體的傳統。
- (4) 他們因着他們的自願貧窮，進到貧窮人中間，甚至成為他們的一分子，這超越了一般的慈善和「扶貧」的範圍。因而亦造成張力，挑戰着我們對貧窮人的付出。

- (5) 他們以禱告為生活的中心、生命力的泉源。他們不單以禱告支持他們在窮人中的服侍，更同時以在窮人中的服侍支持他們的修道生活，形成了「靜」和「動」兩種信仰實踐的雙向張力。
- (6) 他們把與貧窮人的團結共融，聯繫到世界的和平和基督徒的修和合一，來構成在意義上有連貫性的行動，使這些行動的意義互相豐富起來。
- (7) 他們不介意，甚至重視在微小的人身上作微小的工。這些微小的行動即時雖然不能有甚麼可觀的作用，但這些有意義的行動，卻能像酵一樣發揮影響力，改變很多人，重塑着世界。

一個活的隱喻可以不斷被重新詮釋而產生新的意義，泰澤團體和羅哲弟兄的生命比喻也是這樣。他們的信仰實踐，或許因為自願貧窮而帶來「當下的活力」，是如此有創造力，以致不同的人可以在不同的處境中去「讀」它，從而得着豐富的啟發。泰澤團體可以說真正是一個「活的比喻」，為我們示範了貧窮與富足之間的創造性張力，是十分值得我們去經歷、解讀和學習的。

撮 要

本文嘗試運用法國哲學家呂格爾（Paul Ricoeur）的詮釋學，尤其其他對聖經比喻的研究和他的行動詮釋學，去解讀法國泰澤——一個基督教跨宗派修道者團體——對貧窮和苦難的回應。本文分析泰澤在貧窮人中間的行動，為何在基督徒之間及俗世社會中引起這麼大的回響。結合呂格爾對比喻和行動的詮釋，可以了解表面看來微不足道的行動，如何把「給貧窮人的福音——上帝國來臨的好消息」更深更豐富的意義帶出來，以及由此反思基督徒以信仰實踐回應貧窮和苦難的一些可能性。比喻化的詮釋強調想像力和創意，因此能幫助基督徒「應用」經文時避免簡單地「複製」經文的內容，而留意文本、生命和處境間的互動關係，在回應普遍不公義的處境和信仰的要求時，作出有創造力的行動。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an attempt to interpret the practical response of the Taizé Community in France to poverty and suffering, using the hermeneutics of the French philosopher Paul Ricoeur, especially his study of parables and his hermeneutics of human action. In this article, I analyze the things that Taizé has done among the poor to find out why it is so influential in the secular society as well as among Christians. Through a reading which combines Ricoeur's hermeneutics of parable and his hermeneutics of action, we can understand why small and seemingly powerless actions may bring out the deeper and richer meaning of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of God as good news for the poor." Reading the life of the Taizé community as parable will help Christians reflect on the possibilities of responding to poverty and suffering in action. Since parabolizing interpretation emphasizes imagination and creativity, it can help Christians avoid "copying" the content of the Scriptures in their application. Instead, Christian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ext, their lives, and contexts, in order to act creatively in response to the widespread injustice in their contexts and the demand of their evangelical faith.